



杨勇：与西部江河共命运/角色错位带来的困惑——田桂荣的环保生涯（下）/孜荣：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如何让教育有力量——“培育公民：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反思”师生研讨会纪实/我们开自己的食品超市——记美国纽约食品合作社/对你帮助的人存一份批判之心

@民間

行动改变生存

2010年 第八期



@民間

第八期/2010年

在线阅读/下载: atminjian.ngocn.org

博客: zaimianjian.ngocn.org

联系邮箱: zaiminjian@gmail.com

编者的话

也许是巧合，这一期所展示的民间人物都与环保有关。

一脸胡茬目光冷静的探险者杨勇不久前刚结束他的又一次近五个月的行程。这位地质学家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民间立场关注着中国西部江河的命运，他关注的方式就是排除万难走过去，以亲身所见提出科学警示。2006年起，他开始关注数据模糊、备受质疑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他组织了一只独立调查小组，在每日都面临险境的情况下，尤其是突破冬季青藏高原科考禁区，对调水区、工程区、受水区进行了三次独立考察，他们对工程提出的建议弥足珍贵，同时，他们身上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也

是令我们敬佩。

有一本书最近以令人惊奇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在快速流传，那就是《天珠-藏人传奇》。书里有一个叫仁青桑珠的人，在家乡西藏昌都贡觉县孜荣河谷的11个村，发起成立了村民自愿环保协会。从2003年以来，这个“非正式的组织”，激发每个村民都成了环保志愿者，一直在种树、捡垃圾、巡护山林防止偷猎。仁青桑珠兄弟让我们相信，任何人其实都有能力保护本地的环境，只要愿意付出；环境保护其实非常简单，其实你每天都在兑现。

“环保农妇”田桂荣是个存在一定“争议”的环保人士，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本职身

份和她所从事的事业之间的距离，也因为她做事的方式实在有些特别。怎么特别？本期的《角色错位带来的困惑》和第五期《骑虎难下，那不骑着考虑往前走》里，会有许多田桂荣的环保故事。

每一期杂志都会有一个栏目关注全球公民社会领域的故事，好点子，好创意。一直带领自己的机构帮助推动社区参与的宋庆华老师在美国期间，发现了纽约的社区食品合作社，《我们开自己的食品超市》从另一个层面讲述美国人：合作做事对于他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关注公平、公正、环保怎么变成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

另外，《如何让教育有力量》，《对你帮助的人存一份批判之心》也是很有看头的文

章，相信能给你带来新的思考。

在我们送出新一期杂志时，2010年已经来临，伴随着新年脚步的是北方的大雪和南方的寒流，但迎面而来的冷风里有清新空气。



目录

民间报告——焦点

3

杨勇：与西部江河共命运（郜璐莉）

角色错位带来的困惑

——田桂荣的环保生涯（下）（窦丽丽）

孜荣：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卓玛）

公民课堂

47

如何让教育有力量

——“培育公民：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反思”师生研讨会纪实（孙国嫒）

全球公共生活——接点

58

我们开自己的食品超市

——记美国纽约食品合作社（宋庆华）

思考与感悟——茫点

70

对你帮助的人存一份批判之心（寇延丁）

野花烂漫——彩点

74

2009.12.5：建筑工人关爱日

我有艾滋病毒，可以拥抱一下不？

“和谐民族的一盏微光”

又是一年“11.19”

“听草原的孩子，讲草原的故事”

大象粪便来造纸

推荐

83

《请投我一票》纪录片 导演：陈为军

《看见看不见》纪录片 导演：云·温达斯等

《人造风景》纪录片 导演：Jennifer Baichwal

《无米乐》纪录片 导演：颜兰权，庄益增



编者按:

1952年10月，毛泽东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这就是南水北调设想的由来。经过50年的规划、勘测和研究，分别在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规划了三个调水区，形成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中线工程陆续开工，而西线工程规划考察数千人花了4个亿，却遭到民间诸多疑问。地质学家杨勇独立筹资，以极简陋的条件，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2006年、2007年及2009年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调水区、工程区以及受水区进行了地毯式全线调查，350多天，总行程93000多公里。杨勇第一次以公民身份为国家工程提供决策依据，也用一系列科学问题对西线工程提出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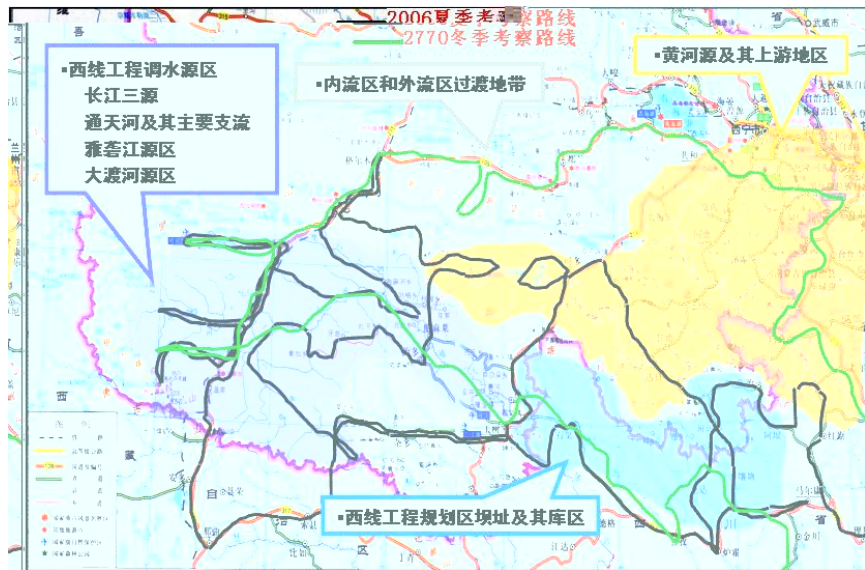
杨勇：与西部江河共命运

文/ 郜璐莉

2009年6月18日，杨勇背起行囊，又上路了。这一次，他们要考察的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受水区。这一走，又是四个多月，43000多公里，饥寒，疲惫，遇险无数，但杨勇总是不以为意。用一位随行队

员的话来形容：他其实是在享受那些艰苦的过程。

同事曾经对杨勇有过这样的描述：“杨勇从来对各种野外探险设备不屑一顾，什么冲锋衣、登山靴，探险家不需要这些，冬天，杨勇



2006、2007年南水北调西线夏冬季考察图

就用军大衣一裹，‘藏民怎么生存，我们就可以生存下去。’到青藏高原，杨勇不觉得是什么征服大自然，只是觉得像走亲戚，所以穿得和城里没什么两样。杨勇的所有青藏野外经验都是从藏民中学来的。”

很少人了解的是，杨勇已经为中国的大江大河奔走和忧虑了20多年，1988年金沙江徒步

考察，1991年雅砻江漂流骑行，1992年离开单位攀枝花矿务局，彻底走上民间独立考察河流的道路，青藏高原、横断山区、大渡河、青衣江、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汉江等都跑遍了，为有关部门提出许多全国性的建议。他艰难的一步步，一程程，完成了诸多本应由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考察。而那些珍贵



2009年9月 杨勇在艾丁湖底宿营地

的第一手资料，都是拼着性命得来的。

用实证来说话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要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要开凿通过长江与黄河分水岭巴颜喀拉山的输水隧洞，然后调长江水入黄河。

杨勇最早知道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在

1991年徒步考察雅砻江时，在二滩水电站听说。“不可能”，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国家要在这儿搞22级水电站，怎么可能又从这里把水抽走？他没想到高于科学的还有利益。

2005年3月，四川省老年科学家协会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退休的前副院长林凌又一次向杨勇提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他想组织民间

专家对南水北调规划方案提出质疑，并结集出书，希望用杨勇的一篇文章与图片。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区和工程区是中国众多大河的发源区，生态系统脆弱，地质情况也复杂，又涉及藏区的信仰与文化，涉及许多敏感问题，可工程规划前期认证有许多空白和模糊的地方：水源区没有做长期的调查和观测，包括水文，冰情，冰川等；忽略了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也没有对地质风险的调查评估。但林凌和杨勇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他们也只有通过实地观测才能把质疑说得更清楚。杨勇决心做一次实地调查。

6月份匆匆订计划，一个月后成行。其实夏季的7、8、9月是青藏高原考察的灾难季节，沿途泥沼众多，但杨勇已

经等不及来年。

两辆破车载着8个志愿者，这个民间独立考察队伍从成都出发了。他们将前往长江三源（当曲、沱沱河、楚玛尔河）以及大渡河源、雅砻江源、黄河源和金沙江、通天河相关河段进行夏季考察。考察的钱从哪儿来？看那两辆国产越野车也知道个大概，上面贴满各种机构的LOGO，保护国际（CI）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资助2万美元，《华夏地理》2万元，甚至还有湖北一家超市的标志，他们资助了价值1万元的食物。一家户外用品店赞助了7套冲锋衣。再就是朋友们支持的几万元。队伍中除了杨勇外，都不是职业探险家，也没有地质专业知识，但他们做到了专业队伍没有去做的。

一百多天，他们几



考察中发现的黄河上游第一个沙漠区雅娘沙漠区，海拔4232米

乎每天都要面临饥寒交迫、险情不断、频繁陷车。在玉树160元买的两顶帐篷不是没东西撑就是漏雨，大家只好挤到车里。留下来的两个人几乎是躺在水里过的夜。汽油炉不适应高原野外，每天侍候它做顿饭得四个小时，这还是晚上唯一的一顿，其它时候吃两块干粮或者干

脆饿着。

就这样，他们行程2万公里，考察了20万平方公里区域。看到了长江源区冰川不断退化、水量逐年减少、源区大片地区沙漠化、曾供给长江源区的湖泊变成内陆盐湖……杨勇得出清晰结论：三江源地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能力已经日益下降，持续干

旱、消化的现象这几年非常突出，西线调水工程极有可能打破这里本就脆弱自然平衡，加速演变过程。

杨勇发现，西线调水和下游的水电建设充满着矛盾。既然上游要规划调水，下游为什么还要大规模地建水电站？这样势必会造成浪费。

再一个是技术问题，西线调水源区和工程区每年冬季会有五个月的冰封，那时将无水可调，所产生的冰凌现象也将产生河流凌汛，危及水坝安全。这将是影响西线调水工程的制约性因素之一。工程的前期规划在这个问题上论证不足，也没有进行充分地调查。

杨勇在夏季考察结束后，立刻写出书面报告，通过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向总理温家

宝。温总理将此批复给了水利部和发改委。

9月，四川老年科学家协会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其中地质现场彩图几乎全部由杨勇拍摄。《备忘录》引起各方关注，10月底，三位中国水利和水资源界的泰斗级人物——钱正英院士、潘家铮院士和沈国舫院士——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前期工作的建议》，与此也不无关系。建议认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决策宜十分慎重，需要在充分论证比较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把（西线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查清、落实、解决，提出可行性报告，并尽量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后再启动，才较为稳妥”。

突破冬季考察禁区

2007年1月，杨勇带着不到20万元，两辆陆风越野吉普和5名队员，又一次踏上青藏高原，开始了被称为“挑战极限式”的考察。调水水源区水系和工程规划水库坝群在冬季的封冻过程究竟情况如何，调水的可能性有多大，工程规划上没有三江源多年水文资料。中国科考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进行过几次考察，但都是夏季进行。杨勇决定突破科考禁区，也是自己二十年江河考察的空白，进行一次三江源冬季考察。

这个坚定又冒险的念头把队员们惊住了，夏季考察已经把他们搞得很惨。况且10月以后青藏高原就开始封冻，那时所有的科考队都必

须撤出。但也正因为此，青藏高原冬季的地质水文环境生态资料一直是空白。所以最后，队员们又都心甘情愿地跟上。出发前，甚至陆风越野车公司都打来电话阻止，“我们的车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严寒气候与长时间低温条件验证，电路与发动机都可能出现问題，请你们放弃，如果出了交通事故……”

但他们打算走遍西线调水区所有封冻河流。其实杨勇也不是头脑发热，夏季考察时他已经问过当地藏民，冬季河面是可以开车通过的；至于严寒中的车子，晚上他们用所有的军大衣来“拥抱”，早晨则用柴在下面点火，把发动机烧热，“大卡车司机都是这么干的。”

无数次，急刹车



2009年6月，曲麻菜老城中干枯的水井，海拔4235米

时，两辆越野车就在镜面般的冰河上一圈一圈旋转。杨勇觉得很美，“就像在跳冰上芭蕾”。

沿调水坝址逐渐西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大渡河上的杜柯河，2006年底刚建成的明达水电站进水口及库区十余公里河段完全冰冻封河，发电机组只有一台在运行，发出不到

10%的电。

雅砻江上游第一座水电站——石渠水电站，水库已完全封冻，几乎无法发电。

达曲、雅砻江、通天河的冰凌现象使得沿江坝址冰塞情况非常严重。

楚玛尔河、当曲、沱沱河，全面封冻，几乎看不到流动的水。

……

在最需要水的冬

季五个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基本无水可调！而这么简单的道理，西线工程竟没有考虑？杨勇更不解的是漫长的冬季，这些水电站根本无法发电，为什么在这些区域水电站却越来越多？

杨勇亲自看到的三江源冰封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线工程将加剧黄河的凌汛，导致凌洪泛滥可能加剧。由于水库的建设，河水流速变慢，改变了自然水文，加剧冰封，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没有经过大型水利设施的冬季凌汛检测。

一个大工程竟如此草率。

先管理好水，再调水

西线工程40年规划总投资3040亿元，将修一条508公里的人工天河，是三峡工程投资的3倍，将向黄河上游调集170亿立方米水量，以解决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6省（区）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这个号称“论证半个世纪，研究方案157个”的巨大工程，国家的专业队伍表示工程地区的地质环境、水源条件、生态影响都OK，但却经不住民间学者的稍加拷问。

例如调水量，黄委会的结论是西线可调水170亿立方米，但一个76岁的并非水利方面的科学家鲁家果（四川社科院离休研究员）2004年上书温总理时，初算了一下，认为不可能超



2009年7月考察中车翻入冰河中

过100亿方，结果官方的报告马上改成了80亿立方米。正是这一点引发人们对官方报告的质疑，你说你花了4亿的调查费，为什么别人一批评，你的核心数字就降了一半呢，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奇特的是在西线规划中对移民与淹没损失金额只字未提，所有的只是工程成本。补偿标准是多少、如何补

偿都缺乏数字，被人们批评为“一笔糊涂账”。

杨勇实地发现西线工程的雅砻江阿达水库、鲜水河达曲阿安、泥曲仁达、两河水水电站地址全部在著名的鲜水河地震带上，1970年代曾发生七级地震，是地质上说的青藏高原高应力变形区，其中阿安水库还建在地质不稳定的板岩上。

杨勇其实一直在想，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究竟有没有必要做，那些需要用这笔调水来补给的地区，缺水问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他们有没有可能依靠自身解决水资源缺乏的问题？于是在2009年6月18日到11月6日，杨勇和队员们用142天的时间，从调水源区开始看起，然后把工程受水区扫了个遍，进行了一次地毯式调查。考察结束后，杨勇印证了他的思考：规划受水区应该反思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坐等长江调水。

这次考察中最令大家痛心的是受水区因为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尤其是在黄河中上游的污染带：山西、陕西、宁夏、内蒙等地的黄河干流和支流水系。仅有的水被城市发展、被矿产开采和与之相应



2009年9月15日，终于翻过祁连山五个山垭口

形成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被土豆淀粉制作等低效作业所污染而无法再使用。考察队伍每天穿行在被污染的城市和工业带，密集的烟囱在冒着黑烟，城市上空被烟雾和尘埃笼罩，地表水也都是污水，看到后来整个人都麻木。考察队员周宇说最后对考察都厌倦了。

不光是黄土高原，在祁连山发育的河流流域也出现了水环境污染态势，这让杨勇非常不安。祁连山是甘肃河西走廊重要水源，对整

个西北地区有着重要的水源涵养作用，然而近些年这里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产业无序发展，城市也盲目扩张，用水日趋紧张，水资源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假如河西走访地区再出现因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不资源困境以及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整个中国西北地区的用水将更加紧张。

进入祁连山地区时已到9月，正是当地降雨降雪比较多的季节。那又是一次历年少见的降雨过程，连续多天，当地人都说很难见到这么多雨。为了进入祁连山核心区，考察队连闯四个山头，不断遭遇暴风雪，泥石流，滑坡，在第五个头才闯过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疏勒河源。但正是因为这重重险阻让他们在山里绕为绕去，才让他

们发现了祁连山里面惊人的矿业开发强度。

在祁连山东段石羊河流域最后一个城市民勤，许多村子里的机井盖是上了锁的，旁边的大石碑上用红漆醒目地写着“关”字。由于干旱，当地地下水超采严重，2005年起政府不得不关闭部分机井，由政府统一供水。到供水那天，大家开着拖拉机，推着手推车，带着各种容器前来接水，然后储藏在家中的水窖里。

石羊河的水资源消耗，农业占了90%，而且用水方式非常粗放。石羊河流域水资源仅占甘肃内陆河地区水资源总量的1/4，却维持着该地区1/2的灌溉面积和1/2的人口。要解决石羊河水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建设高科技节水农业，减少灌溉用水，农业节水的潜力其

实还是很大的。

据有关资料，黄河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用水是黄河用水的大头，全流域引黄灌溉面积已经超过1.2亿亩，而达到节水标准的灌溉面积只占二成。许多地方还是“大水漫灌”。所幸的是，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重视农业节水。“要谈节水，农业空间最大。在西北干旱地区，工业发展快的地方，农业即使是弱势，用水还是占到60%以上。”杨勇说。

杨勇迫切想要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的是：“我们大量水资源不足的原因除了自然外，还有科学利用和有效管理都非常不够，包括人们节水意识的淡薄。如果科学利用搞好了，有合理的产业结构，人们增强了节水意识，少污染水资源，我们通过这方

面的努力也许节约的水资源可能比170亿要多得多，为什么不从管理上挖潜力，不从科学发展的观念来挖掘水的潜力，而非要去做工程呢？”

“我做这些调查起到的作用就是：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胶着的矛盾，怎样找到解决的办法？现在很多形势是触目惊心的，完全和



缺水的且末绿洲

科学发展观、和水资源状况相悖离，太严峻了，这样发展下去，以后可能连生存环境都没有了！”

附

调查路上的滑稽事

污水做成景观水：在山西黎城，考察队员周宇下去拍摄一个刚建成的水景观，当场就吐了出来。景观虽然漂亮，黑浆浆的水中散发阵阵臭味。在黄土高原干旱区，几乎每座城市都会把污水围起来，沉淀一下，然后，建成各式各样的“水景观”。

无水的塔河建了望塔：解决水资源困境时，政府想到的办法似乎永远是工程为主，却收效甚微。塔里木河工程整治已经花了80多亿，建了干渠、生态闸

门，但水库没有水，到处都是干的，工程成了摆设。然而周围却建了四座了望塔，一个塔区起码花费上千万元，让你去看塔里木河的“面貌”。

无人的生态监测站：在三江源地区，有关部门建了几个生态监测站，150万一个，设备、房子一流，有非常先进的水文监测系统，有生态定位的观测点，能够进行数据处理，获得数据后还能进行生态分析研究。可它们放了六年了，却没人做监测，连管理部门都不愿意管。乡政府拿它做接待站、招待所。

角色错位带来的困惑

——田桂荣的环保生涯（下）

文/窦丽丽

我曾经三次采访田桂荣，并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和她有过接触。但事实上，无论我采访过田桂荣多少次，无论我接触过她多少次，每一次再见到她，和她聊天，都还是有一种难以置信以及角色错位的复杂感觉，总是不能将眼前的人和她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很好地贴合在一起。甚至在这么多次的交流之后，我依然很难对她所做的事情有一个详尽的了解。

我所了解的田桂荣

我第一次采访田桂荣是在2005年年末，田桂荣来北京领取首届“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奖，第二次是在2006年2月底，她来北京参加“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表彰大会，这两次采访以及随后发表出来的文章，都属于现在正在受到批判的“从外往里写”的典型，“和被访者随便聊几十分钟个把小时”，只了解到一点皮毛甚至连皮毛都算不上的事情，就写成文章拿来发表。尽管如此，我认为，那至少也记录了田桂荣生活中一些零星的片断。

此后，田桂荣似乎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至少是淡出了我的视线，从2007年到2009年上半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关于她的消息也少之又少。



反而跑那么远去考察黄河……

第三次采访她是2009年8月，我去了新乡，去了田桂荣的家和她一手创立的环保协会的办公室，见到了传说中的电池厂，见到了她的丈夫老范，听她讲了她考察黄河的经历，她在新乡做的事情，她的想法。

此后，我又两次在北京见到她。一次是在8月中旬的5.12行动论坛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主办方本来答应报销来回路费500元，结果却没有兑现，让田桂荣有些措手不及，幸亏她遇见了老朋友——《农家女》杂志主编谢丽华，而又恰好，谢丽华正和几位老板在聊天。大家听了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老板当即“承包”了她的火车票。那次，主办方安排

2009年6月份，一位备受尊重的民间环保人士和我提起她，言语之间带着无奈、惋惜，甚至还有点不屑。在她看来，田桂荣这么多年除了回收废旧电池这件事做得扎扎实实以外，其他事情都没做好：费了很多周折和精力才成立的环保协会没有运作好；自己也没有在新乡开展扎扎实实的项目，

的住宿只到活动结束的前一天，所以，活动结束的当晚，田桂荣就得自己寻找住处了。她的目标地点在前门，“那里的小旅馆多”。那天她一共拎了四个包，个个都很重，她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拿得了。而且她对于乘车路线也不甚清楚。于是我充当了她的向导，带领她乘地铁前往。我帮她拿着两个包，十号线换一号线再换二号线，走得气喘吁吁热得全身冒汗。终于从前门地铁口出来了。我陪着她一路向西，看着一个个旅馆向后退，每一个她都说不。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她指着一个看不出来是旅馆的地方说到了。那看起来就是栋普通的居民楼，入口处有一个通往地下室的窄窄的楼梯，我们顺着楼梯走下去，看到了这个地下旅

馆的样子：矮矮的屋顶，窄窄的楼道，很多房间的门都开着，里面传出嘈杂的电视声。

旅馆的服务人员都认识她，一见到她就问：“这次又来开什么会啊？”并且和她开玩笑说：“咱这里的条件和您之前两天住的条件天上地下吧。”田桂荣笑笑，不置可否。田桂荣跟我说，这里的人和她都认识，几乎每次来北京，只要没有人提供住处，她就来这里住。

另一次是在11月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年会上。田桂荣和协会的一位志愿者一起来开会，主办方也不报销路费，只提供吃住。不过田桂荣依然很高兴，对她来说，这是个难得的交流机会。

我写这么多看起来像是废话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证明：



相对于更广大的人群来讲，我应该算是比较了解田桂荣的人，至少是之一。

田桂荣的角色错位

媒体报道田桂荣，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环保农妇”，这个称呼所隐藏的含义其实是：农妇和环保是存在距离的。

田桂荣其实是一个存在一定“争议”的环

保人士，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本职身份和她所从事的事业之间的距离，也因为她做事的方式实在有些特别。

回收废旧电池，没人来送，她就花钱买；考察河流，没人资助，她自己出钱；现在，她贷款维持协会的日常运转……为此，她不仅盘掉了自己的两个店铺，从“富婆”变成了穷人，还拉上自己的弟弟、侄子、女儿做担保



黄河考察路上

从银行贷款。

田桂荣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环保事业，是达到了痴狂的程度的。

一方面是这样执着、坚韧的付出，这种无比艰难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则是田桂荣常常挂在脸上的笑容，说到艰难处，即便眼睛里含着泪，牙关咬得紧紧的，表情依然带着笑意。有人说，田桂荣天

性乐观，还有人说田桂荣是一个有“喜感”的人，无论什么艰难困苦的事情，从她嘴里说出来，就是能让人在感动的同时忍不住想笑。尤其是当她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的时候，充满激情的话语搭配上一些肢体语言，总是能赢得全场的掌声和笑声。

伴随着环保大妈田桂荣的声名鹊起，我们

看到了另外一些好玩的事实：田桂荣为电池厂代言了，田桂荣为房地产代言了，田桂荣为电动小汽车代言了……在中国众多的民间环保人士中，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对此，大家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虽然偶尔带着调侃，说田大妈“心眼儿活泛，经营有道，对于名人效应的运用也很到位”，但，那就是调侃而已。本质上，很多人还是认为，田大妈的代言是吃点亏的，代言费太低，而且流传度不高，尤其，请田大妈作代言，可能只是商人的一个炒作点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厂家有多环保。

实际上，这类“经营活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乡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生存状况。

不管表现出来的多

么令人眼花缭乱，多么令人不可思议，我却觉得，田桂荣始终保留着作为一个普通农妇的纯朴价值观。她更看重的是名誉，是口碑，是社会给予她的肯定，她珍惜这些。环保协会的办公室发生入室盗窃事件后，田桂荣把历年的资料和自己的奖杯、火炬都搬回了住处保管。有人要出29万买她的火炬，她也拒绝了。骨子里，她相信政府，也相信污染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政府出面，所以，她重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她所推动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民间环保斗士的身份。她希望能够和政府搞好关系，并以此来赢得环保协会在当地的立足与生存。

写给政协的 污染调查报告

我一直努力追根究底地想了解田桂荣以及新乡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在新乡当地开展工作的情况。田桂荣告诉过我，今年，协会集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新乡市内的各条河流进行了大排查，详细调查了这些河流的污染源主要有哪些，并且打算制作新

乡市污染地图。我很想弄清楚，这些调查是如何进行的，调查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和阻力，调查的结果如何。

2009年11月，田桂荣来北京参加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年会，她随身携带了一份《新乡环境调查情况》，这份文件，就是她以及环保协会今年对新乡市内河流进行调查的情况汇总，如下：



田桂荣指着她们采集的污染水样

新乡环境调查情况

为了创建环保城市，为了我们新乡的天更蓝水更清，经志愿者和群众举报，2009年4月~8月，新乡学院、新乡医学院配合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对新乡四区八县的河流及辖区化工厂、造纸厂等进行了拉网式的大排查。

经调查发现，多数企业均能按照国家政策达标排放，但仍有极少数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向卫河、共产主义渠、孟姜女河、文岩渠等偷排暗排现象，严重污染了当地河流水质，有些企业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影响当地空气质量和庄稼生长，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获嘉县

1、楼村西南角一纺织厂，污水直排共产主义渠，排出的污水检测结果cod为50mg/l，血红色的污水令人感到恐怖，要求相关部门公开此厂环评信息。

2、新乡市锦源化工有限公司，看守大门的人员说厂已停工，但据调查人员

考察，院内设有一个生产化学原料的大化工厂，污水排向共产主义渠，此厂属于无证经营。

3、据当地群众反映，楼村西南角一小化工厂，无牌无名，拒绝调查人员入内，排出的污水有农药味，直排共产主义渠，要求相关部门公示此厂环评信息。

新乡县

1、新乡县豆腐村六通化工，生产农药，污水直排西孟姜女河，当地群众反映强烈，抽取污水检测结果COD为196mg/l，要求相关部门公示此厂环评信息

2、新乡市惟德化工有限公司，新乡县文营的群众意见很大，抽取污水的检测结果显示COD为240mg/l，要求相关部门公示此厂环评信息。

辉县

1、永昌化工，烟囱排出的烟有较强的硝酸，当地群众反映强烈，意见较大，要求相关部门公示此厂环评信息。

延津

1、森林公园向北三公里处，有一无牌偷干的黑厂，生产松香，污染空气，

严重影响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意见较大，要求相关部门及时调查，依法取缔。

封丘

1、新乡市金湖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二硫化碳、橡胶助剂等，严重污染空气。据当地群众反映，此厂有向地下注水的嫌疑，调查人员到此厂考察时，领导推诿扯皮，拒绝出示营业执照和环评报告。要求相关部门公开此厂的环评信息。

原阳

1、黄河化工，调查人员在距此厂百米之外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当地群众反映强烈，据群众说，因为此厂排出较重的气体，严重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此村的癌症比例也相当高。要求公开此

厂的环评信息。

2、在黄河化工的附近，有一个造纸厂，污水直排文言渠，泛着灰白色的污水绵延向东两公里之多。希望相关部门加以及时调查。

建议：

1、希望落实环保主管部门，及时调查上述情况，依法查处，信息公开。

2、认真落实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政策，积极行动起来，创造环保模范城市。

这份文件，是田桂荣提交给新乡市政协的，上面的污染企业的情况都是环保协会今年调查的结果。据她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一些企业已经被整顿或关停。现在，新乡市四区八县内的污染企业，包括家庭作坊，这两三年被关停的有上千家。目前剩下的这一百家左右，主要集中在新乡县和获嘉县，由于这两个地方的污染企业都有很强大的背景，其所有者大都是人

大代表、劳动模范，所以，整顿起来不太容易。对此，田桂荣也是愁眉不展。

田桂荣说，每年暑假，环保协会都会和高校学生合作进行调查，她也会叮嘱那些学生，回去以后调查一下自己家乡的情况。平时，她和协会的几个志愿者，在接到群众的污染举报后，也常常深入现场去调查，有时候会被污染企业放狼狗咬，还要忍受别人的大声吼叫，每当这时，她都会觉得

环保的力量很渺小。但是，每当听到群众的肯定，得到她们的支持，她又会觉得很欣慰。上面提到的延津县的案例，在她们调查反映过以后，当地的小孩打电话给她：“奶奶，已经关了，我们现在干活的时候不呛人了。”听到这些，田桂荣总是很高兴。

上面这些，几乎就是我所能呈现的有关田桂荣及环保协会工作的一切。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信息，比如说，由于电池厂破产，原来由电池厂提供的办公室就无法继续使用了，当地环保局会为环保协会提供新的办公室。

但是，从上面这些内容中，我始终觉得，我无法触摸到田桂荣和环保协会工作的核心。我想，或许是因为缺少

细节，缺少步骤，缺少更生动的和污染企业交涉、和政府交涉、和受害者交涉的细节，以及更深入的内容。在和田桂荣的交流中，我没有获得这些。

长期以来，各方面对田桂荣的关注点一直很集中：环保农妇，回收废电池，当村官，考察黄河。对于她在新乡市内的工作一直较少涉及，我想这和田桂荣本人也有关系，她不太愿意自己在新乡市内的斗争情况被过多提及，她不愿意给当地政府难堪。她搜集污染信息，接收群众举报，然后去现场看看，然后将信息提交给政府相关部门，然后希望政府能解决问题。在新乡市内的污染问题上，她没有依靠媒体，甚至没有面向公众（直接污染受害者除外）。

所以，我在想，除非我下定决心，到新乡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去工作个一年半载，否则，仅靠和田桂荣的语言交流，我是无法对田桂荣本人的工作以及环保协会的工作有一个详尽的、切实的深入了解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她的尊敬。



孜荣：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

卓玛 编辑

从没见到做事如此齐心的人们。1700多人，多数从未上过学，不知道外面的环保是怎么回事，但山坡、河滩上到处散落着他们种下的树；他们排班巡山，阻止猎杀野生动物；挖虫草人丢下的垃圾会有人捡起……他们还有一个自发的森格南宗生态环境保护自愿协会。森格南宗是狮子的意思，是当地人尊崇的神山。看着他们说起环境保护时突然亮起的眼睛，听着他们的故事，“感动”也好像是个轻飘飘的词，不，你想要融入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守护这里的山川自然草木，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平等的生命认同。

十二月，昌都至孜荣的山路一片白雪皑皑，清净，圣洁。而他们会说，夏天，你再来吧，满山都开着鲜花……说这话时，他们的眼里却满是忧虑，因为他们触景伤情，因为带领他们保护神山的仁青桑珠和弟弟其美朗加正遭遇劫难。我们不相信，有着那样纯净心灵、全心为大家的人会因此而有牢狱之灾。

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



流淌在孜荣的金沙江上游支流热曲河 卓玛摄

孜荣位于西藏东部，海拔3700多米，顺着山间流淌的热曲河及它的支流，有5个行政村和11个自然村。如果你坐飞机去孜荣，要从成都向西飞往西藏八宿县邦达机场，然后坐车沿214国道盘山公路往北到达昌都，再折回东南，差不多需11个小时的车程。

上图中那条蜿蜒的白带就是热曲河，它穿

过右边的峡谷，折向东去，在山间奔流四十多公里后，就汇入了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孜荣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保护神山圣湖的意义有多大。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吕植说，神山圣湖位于长江、黄河和国际河流澜沧江的、怒江的发源地和上游，这些河流影响着下游约300万平方公里5亿



仁青桑珠在2005年11月29日神山圣湖会议上 刘鉴强 摄

多人的生活。它们的稳定对于藏区、全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和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光明日报的环境记者冯永锋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四年前在康定，那个身穿藏袍的康巴汉子举着手机，兴奋地向村里人“实况转播”一次关于神山圣湖的保护会议。

那是41岁的森格南

宗生态保护协会负责人仁青桑珠。他没上过一天学，也不懂汉语，却不肯放过北大校长许智宏的每一句话。电话那头连着孜荣几十个农牧民，他们挤在仁青家里，背后是高高耸立的森格南宗神山。他们想知道，自己按照藏族人的传统文化所做的事情，外面人怎么看。

孜荣的百姓开始做环保，源于仁青桑珠的



村民们刚刚种上的小树苗 刘鉴强 摄

个人行动。1997年，这位当时33岁的康巴汉子看见森格南宗神山的转经路上很多树枝被折断，心里不快，便写了告示贴在转经路的岩石上，希望大家保护山林。两年以后，当地要修路，路通到哪里树就砍到哪里，仁青桑珠去找政府，也给各家各户写条子，但收效甚微。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弱。

问起大家后来为什么都愿意参与环保，你能听见几乎一致的回答：仁青做的事情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来做嘛。实际上，保护环境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正常。藏民从小所受的就是不杀生的宗教教育。在孜荣这个半农半牧区，食物除了青稞就是牛羊肉，可牛马羊对

他们来说也是亲密的伙伴，每次宰杀都会让他们很难过，都要做好法事。

他们不知道环保这个词，但环境文化弥漫在日常生活中，宗教，医药，文字，游戏，歌舞，到处都是。

仁青桑珠小时候，爷爷对他说，千万不要学别人钓鱼，否则你会长豁嘴。仁青桑珠想，哎，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但他还是难以拒绝钓鱼的乐趣，有一次，仁青桑珠偷偷钓鱼，先做个小鱼塘，把钓来的鱼放进去看着玩，然后放掉。妈妈看见了，哭着说：“做这种坏事会带来灾难，我的儿子怎么这样啊！”

仁青桑珠很后悔，暗暗下决心再也不杀生了。

一天，有头牛进到仁青桑珠家的青稞田

里，吃了一大片青稞，吃完了，还舒舒服服躺在里面睡觉。小仁青气坏了，拿起一块石头慢慢地走过去，想狠狠地打一下。过去一看，那牛睡得很幸福的样子，仁青桑珠想了想，如果石头一下子打下去，太罪过了。于是走回去，远远地喊起来，牛被喊醒，摇摇摆摆地走了。

仁青桑珠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长大。有一年他到北京，与一些环境NGO接触。他们说，老虎豹子快没有了，所以要保护。“这与我们藏民不一样。”他说，“在我们眼里，苍蝇与老虎是一样的。我关心的是生命本身的东西，并不是对人类重要不重要。不是出自对老虎的美的欣赏，而是珍惜每种生物的生命。”

2003年，哈希·扎西多杰来到孜荣，给村民



哈希·扎西多杰在喂小藏羚羊 图片来自网络

们的环保带来转机。

扎西多杰是青海玉树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当年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的秘书。扎多来孜荣考察森林保护，每天都与村民谈到很晚。

村民们说，他们很想保护自己的森林，“我爷爷那时候，这里还有茂密的森林，有老虎、野人，可是后来，

树全砍光了，像剃了光头一样。仁青桑珠说。但以前的树是政府砍的，现在要种，政府会不会不许呢？以前他们想保护野生动物，但来打猎的，恰恰是政府的人。2002年，县公安局的来打猎，仁青桑珠不敢当面说，要护林员请求公安局不要再打猎。公安局很生气，来了3个警察，响着警笛，将车在村里开来开去，村民

们很害怕。

扎西多杰说：“根本不用怕，你们这里属于长江源天然林区域，是天保工程之内的，你们所做的，符合国家保护政策。”扎西多杰建议他们成立一个组织，这样更有力量。

然后，仁青桑珠决定成立以保护森格南宗神山为核心的生态保护协会，所有成员自愿加入。他给每家每户写了

一封信：“环境保护的利益是放眼将来，是公益事业，大家都知道，我仁青桑珠是个没钱的人，大家做了这件事，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但对我们的村、我们的后代有好处。全孜荣部落11个村，加上4个寺庙的几十个喇嘛尼姑，一共1700多人，全成了这个协会的成员。仁青的弟弟其美朗加是全村人一致选举出来的



孜荣人 卓玛摄

村长，也是协会的会员，村委会主要工作人员是护林员。

2003年5月18日，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志愿协会的章程。村里人说，每一条都是经过讨论的，最后全体会员一致通过，其中第一条就是：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维护国家和平与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志愿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有了这个协会，村民们进行环境保护的力量大多了。乡里一个副书记对仁青桑珠说，你们保护环境挺好的，但说实话，你们的热曲河里的鱼很有名，上级政府部门来人，那鱼是接待的主要菜，你们不能组织禁渔。他还说：

“其实环境保护，国家只是说一说，并不真当回事，最重要的是脱贫。环境保护那是富人

的事。”

仁青桑珠说：“能不能打鱼，不是我说了算，是全部村民来决定，我们有制度。”很快，到这里钓鱼的人很少了，但乡里管林业的一个藏族人仍然来钓鱼。一些村民就与他交涉。

这位乡干部叫起来：“你们哪来的权利？谁让你们来做环境保护的？天是国家的，我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我管乡上的林业，保护不保护，我来决定。”

其美朗加摆出政策和法律。没想到，老百姓讲法律，更激怒了那位乡干部：“你居然跟我讲法律！我才是管法律的！”

其美朗加说：“好，你管法律，那你写个字条，说你说了算，你想钓多少就钓多



有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自觉》能够多印些，也漂亮了 卓玛摄

少，而且你允许别人随便钓。”

那位乡干部渐渐软下来，走了。

仁青桑珠说：“我相信以理服人，反对比谁的刀子长。”

仁青桑珠自己办了一份藏文小册子，名为《自觉》。在这本小册子上，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佛教有关生态保护的教义。里面还有一句话，表明这个村庄环境保护的基本原

则：以国家的稳定、民族政策和法律为依据。

2003年春天，生态保护协会开始种树，计划是1万棵。可是，到哪里找这么多树苗呢？

县林业局的人说：“你们这是好事情啊！”当即给了他们1000棵树苗和一麻袋草种。

山坡上种树不容易，要从河里背水浇灌这些细嫩的小树苗。

2004年，政府给他们的“喜讯”，将他们冲击得几乎站不住脚。贡觉县林业局一下子给了40万棵沙棘，还有其他树种4万棵。这一年县里有80万棵沙棘的种植任务，可找不到人种，正愁完不成呢。村里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唱着歌，跳着舞，满山遍野去种树。全村人用了十多天才把那四十多万棵树种下。2009年12月，



协会资料



协会资料



索朗群培说，这个刺刺树（沙棘）上的果子很好吃
卓玛 摄

我在孜荣看见，山坡、河滩等容易水土流失的地方，遍布着他们种的树。

2005年，为了奖励孜荣人种树的功劳，县里奖励了他们发动机和抽水机。



协会资料



协会资料

这下浇水可方便多了……

种上树浇上水可没有完事儿，他们每年要

定期去检查、记录树的成活率，还要测量一下长高了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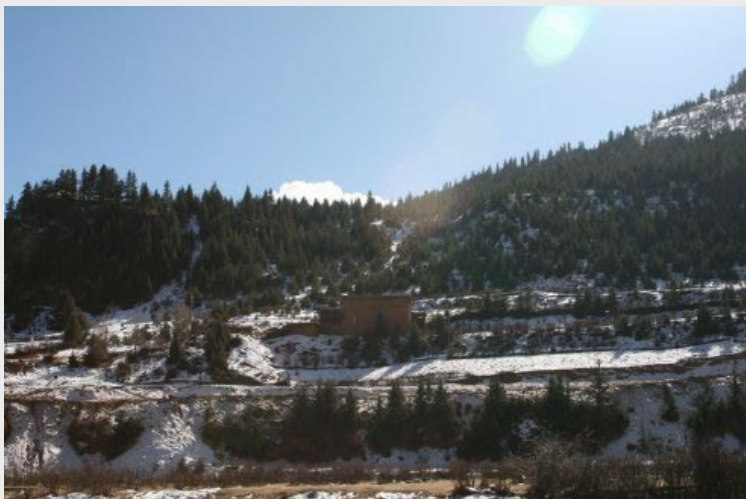


协会资料



卓玛 摄

还有这个，村里的一处种植实验田。里人说，原先都被砍秃了，是仁青桑珠到处找来树苗种上，山坡才像现在这样漂亮。



协会资料

当小树一点点多起来的时候，村民们继续恢复他们的传统：巡山。在历史上，根据部落法律，每家每户都要派人，骑着马，巡视神山，检查是否有人偷猎。巡视之后，他们才决定资源的利用：哪里的树可以砍，什么时候砍。现在，他们略微改变了方式，离科学更近一点。他们制定了4种表格，前三种表格，巡山的人都要拿在手里，随时把他们观察到的

记录下来，三种表格分别记录树、野生动物和土地的情况。而第四种表格，要放到村民的家里，如果对保护生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就要写在上面，交给大家讨论。

他们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狼来吃羊怎么办？这里很贫穷，本来羊就不多。最后，他们决定，谁要是打死一只狼，罚款50元。这意味着，当狼威胁到农牧民的生活基础时，可以

打死狼，但是，通过罚款，又告诉大家，这种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之所以要讨论狼的问题，是因为2002年之前，狼多成灾，村民们最心疼的，是自家的奶牛被狼咬死。

可是2004年到2005年，一只牛羊也没被吃掉。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灵！我们的环境只保护了一年！”仁青桑珠高兴地说。

村民们保护神山，种树种草，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狼有了食物，就不再袭击牛羊。仁青桑珠说，野生动物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好像山神给动物们打了个电话，说，这村的人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了，你们都去吧，狼也不要吃他们的牛羊了。

村民们更加相信，人与自然是可对话的。



协会资料

村民们不仅种树，还开始清理神山。2003年春天，在一座山上，50个村民捡了3天，将挖虫草人丢下的所有垃圾捡出来，一片纸都不留。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坑，将垃圾埋起来，上面撒上草种。村民们细心地观察着，春天过去了，草没有长出来，夏天过去了，草还没有长出来。看来这个方法不行，造成了二次污染。到了冬天，他们将垃圾刨出来，晒干，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年年挖虫草，年年都会有垃圾，村里人穷，如果不让挖的话，生计怎么办？于是大家一起讨论，虫草可以挖，但垃圾要自己带回来。挖虫草刨的坑，他们也一定要填起来，将原来的草皮补上。

村民们讨论的不仅是环境保护问题，其实



还有生计问题：如果挖了坑不填起来，3年之后，草场破坏严重，虫草就没有了。

仁青桑珠说：“这些道理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是自己讨论后认识到的。”这也是民主讨论的好处，自己讨论做出的决定，大家就会自觉地执行。

突然有一天，政府来了一个工作组，说是来查他们。后来才知道，有人告到政府那里，说这里的村民在乱搞，在庄稼地里种树。查完了，领头的县人大主任说，十几年来，我



没见过这么好的村庄。

今年是森格南宗神山的本命年，从年头到年尾，无数信徒来转山朝拜，路上的垃圾也多了起来，但村里人竟然不敢再捡拾。每到一村，见到的人都会问：到底做环保是对还是错？虽然我们总回答说那是天大的好事，可他们依然害怕。

只有仁青桑珠的女儿德青卓玛还时常捡些垃圾。

仁青的家就在神山脚下，今年从年头到年尾，每天都有三五十个转山的人在他们的家免费喝茶、留宿。德青卓玛每天一大早就起来



给大家烧水煮茶，准备食物，常常自己都来不及吃饭。有时候大家被子不够了，她就和外婆挤一张床，把被子让给转山者。周围的人都叫这个善良的女孩子“神女”。

编辑后记：

走过孜荣的山水，见过将近一百五十位孜荣人，从那些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的话语里所听到的，从他们的眼睛里所看到的，都让我们坚信仁青桑珠和其美朗加的无罪，并期望法律的公正裁决。

若想了解更多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爱情，他们如何看待生命以及佛教如何影响着他们的生命过程，请看西藏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刘鉴强所著《天珠——藏人传奇》。这是我所看过最好最好的纪

实作品，大量的采访和出色的写作，让它像小说一样好看。但它又不止是好看，它所给予我的思考和震撼已经多年未遇。



他们的课程是和一些公民社会团体接触而产生的启发。

他们需要更多的公民社会团体作为支持机构。

大家在批评现在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也说到问题不仅仅出在教育上，也不能仅仅靠教育完成。

如何让教育有力量

——“培育公民：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与反思”师生研讨会纪实

文/ 孙国嫒

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召集的这个研讨会，觉得很有启发，觉得做教育的工作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从主持人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满足感”，我猜想，那是因为他看到这次的研讨会能够碰撞出那么多新点子，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因此流露出这幸福的笑吧。

我觉得这次研讨会
有两条线，一条是**有关公民教育的内涵及其意义的讨论和厘清**，另一条是**有关成长的感悟**。

一。

上午来自香港的媒体人梁文道、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郭宝松博

士，来自香港大学学生发展处的庄陈有进行了分享。

梁文道开始便提到，他理解中的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公民。而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培养知识，更是“能力”，做公民的能

力。梁文道理解中的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省自己生命的能力。他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不经检讨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力量，生命经验的确需要反省和检讨，找到再出发的基础。第二点呢，这个公民的能力不是区域性、地理性的。它的意思是说，公民不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阶级等身份角色所捆绑，能够关心其他身份的人的生活。这是一种开放性。第三点是，他/她要具备具体的能力去想象和他/她不同的人的生活，并且与之共处。

梁文道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务家，他自己就曾经做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好像也在大学里教过书。曾经参与建立牛棚

学院（大概类似那种社区学院，是体制外的），希望促进公民社会、媒体和学者这三类群体的连结。比如，他们曾经邀请绿色和平的人去讲一个学期的全球变暖的议题。也有请流动小贩来授课（用他的话说，他喜欢在牛棚书院里，请那些常人认为不应该教书的人教书），画出他心目中工作区域的图；然后请那些管理小贩的城管来说，他眼中的城市管理。这样双方的声音，让学生去思考。我猜想，这也是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基础吧，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后来因为资金原因，牛棚书院停止了。他又去做中学（肇基创意学院），尝试将中文课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于是在那里

教写作课。比如他一次写作课的内容是，请同学们访问九龙城（肇基学院所在，而且是香港的一个旧区）的老街坊，并且帮助老人家写投诉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开始关注这个社区的问题，而且提高了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学会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如何与政府打交道。我觉得梁文道真的很高明，写作课也可以上成这样，很佩服。（回顾一下我们从小上的写作，真的自叹弗如。我们需要有思想的老师，有创意的老师）。

他的另一堂写作课布置的任务是，让学生写一封给家长收的信，题目是《我是一名同性恋》，让学生想象那种处境。之后，在学生中组织一场讨论。我相信这样的课程远远比简单

的讲我们要理解同性恋群体深刻的多。

他还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很多学生向他抱怨说学校出了一个新校规，早晨迟到半小时的学生算作旷课一天，这个规定出台之前没有在学生中进行咨询，但是事实上早晨第一节课不上的同学很多。梁文道在写作课上让学生写一封给校长的投诉信。然后告诉校长先不要急于反馈。第二周，梁文道又给学生了一个新的写作题目，是“如果你是校长，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之后，梁老师和学生分享了校规和立法之间的异同。

我觉得这种教育是很有力量的。**透过写作课，带入公民教育，让学生换位思考，去体验、去思考。**这样的教育需要一个开放心灵的老师。老师给到学生足

够的空间，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而不是一开始就否定学生。这个写作课，让学生去观察社会，之后进行反思，而非闭门造车。不仅仅是写作课，很多课程都可以融入公民教育。而我们的老师有没有公民意识呢？自己是不是公民呢？

梁文道说道，他越来越开始关注正规教育以外的力量，这也就是他的尝试，因为他越来越对正规教育不抱希望。（我的思考：什么是正规/非正规教育？）

接下来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周宝松的分享。他在中大教“伦理学”、“政治学”，也教“通识课程”。他提到了几个观点：其一，“公民”这个词，有一定的政治性，和“什么样的国家”是有关系的

（也因此，我期望多读一点政治学的书籍，理解“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二，他也提到“政治学”就是要研究人们如何一起生活(how to live together)的根本问题，“伦理学”讨论的是我怎么活着(how I live)的问题；其三，也是他演讲的重点，他提出了三种通识教育观，我觉得其实也是不同的“教育观”。

第一种是被他称作“工具理性教育观”。教育者给定一个目标，然后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对目标不一定有反省。他觉得，在现在的市场社会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能赚钱，于是“增值”成为了一个这样的目标，成为了很多学校的目标。

第二种是“培养能

力的教育”。能力包括批判能力、理性思考。这种教育是培养学生能够对“目的”有更多的反思，学生是需要有“主体性”的，学生能够自我觉察。请注意，这是学生“自己”去选择，而非教育者给出一个“目标”。

但是，周老师也认为这种教育观虽然与第一个教育观相比是个突破，但还可能会有价值观的缺失。如果教育仅仅是培养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一种价值观，一种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的价值观。

因此，第三种教育价值观，在周老师看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强调批判反省，学生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是怎样的。

通识也强调多元的理解，对什么是好的社会和生活可以有自己的多元理解 and 实践。

我个人觉得，这个三种教育观的分类很具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正规教育就是第一种教育的话，我们觉得这种教育很害人，学生没有了主体性，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身为NGO人，是不是自己也常常复制了这样的教育模式呢？NGO在做改变社会的事情，也是改变观念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在实践哪个教育观呢？我们是否能给参与者、服务对象足够的空间，去鼓励他们的主体性，去真的让他们“充权”(empowerment)呢？抑或是，我们是新型的“洗脑者”“灌输者”呢？我们天然地成为“洗脑者”和“灌输

者”这一点其实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就是从小被“灌输”、被“洗脑”而长大的。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是人，我们有反省能力，因此我们能否反省到自己的教育模式，真的去实践一个开放的、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呢？

另外，很多NGO的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为了社会好的，似乎有了天生的合法性，大众都应该跟着走，加入进来。但其中的风险在于，这些NGO人能否反省自己的价值，真的给参与者自主性空间去认识自己的想法、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看到在某些NGO做的倡导活动中，不幸的是，所谓“参与”的公众也成为了一个没有自主性的工具。

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教育者，也是一

个人，必然有自己的价值观。教育者需要有自己的对世界理解的立场，但很关键的是，能不能反省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在向学生介绍自己的想法的同时，给到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批判反思，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

后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的于老师也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在大陆没有通识教育，这方面的课程设置是凌乱的、不成体系的。他也提到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要同时进行，不能等到有了公民，再去建设公民社会。这给我的启发是，更多的去了解、剖析公民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培育之间的关联。

他还提到，从大学再开始做公民教育有点

晚了，应该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开始。

上午最后一个演讲是来自香港大学学生发展中心总监庄陈有。陈有讲的内容，我心有戚戚焉。他现在的工作也是推动学生关注社会，扩大视野，在做世界公民教育。他所在的香港大学发展中心的使命是，培养改变人类生活的倡导者。他的演讲主要从实践层面展开的。

他们着力寻找一些社会议题，比如全球变暖、艾滋病、和平/冲突、贫困等，进行青年教育——让学生体验、反思，这些问题“与自己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议题很遥远，但是陈有认为“经验”可以改变学生的看法，他们组织一些服务学习，或者是探访，比如他们的学生曾去河南艾滋村，也有去柬埔寨等发展国

家。

他觉得这类教育工作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很多学生做这些可能是因为这会成为简历的一部分，完全是实用主义，陈有很不喜欢；第二个危险是，学生回来了说“我们真的好幸福”，“于是我们要尽量赚钱”，而不是多一点去理解生活着的世界是不公平的，如何去改变这个不公平。陈有看到，一系列教育的工作让学生有了更多的行动，比如他们港大的一群学生在去柬埔寨探访之后，成立一个NGO叫做“Humanity In Focus”（青禧会），持续地开展工作。

陈有也坦言，有两个事情他做不到。一个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很难成为正规课程的一部分；另一个是，他不能证明这样的教育好不

好，无法评估。这样的教育每次参加的人数量不可能很多，参加完这些活动，成绩也不必然提高，而且和就业前景也没有什么关联，能够看到教育结果的是学生的个体感受。

下午的环节就进入了“实操”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来自联合国国际学院的黄宝华 的分享。他们学院提倡的是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强调人与自我、与他人（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联合国国际学院有一个全人教育办公室，通识教育办公室。他们有个模型（如下）。我觉得这个模型和通常的教育模型类似，强调头脑层面的思考，心的层面的体验以及行动层面的实践。

接下来是来自云南大学的兰树记分享他们

在云大开展的服务学习。云大的服务学习主要是依托社工培养课程，当然也开展全校的公选课。他们的挑战包括资金方面的压力，学校没有什么拨款，很多都是基金会支持的。另外也面临学生学习的功利性、教师的时间及精力不够，同辈督导的培养问题。

梁文道问国内做服务学习会面临什么问题，答曰，一个是社会服务机构少，不能提供实践地点，也就是没有社会支持体系；第二是对服务对象可能产生消极影响。服务学习肯定对学生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对服务群体呢？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做服务学习的组织者要思考的问题，并且在实际层面做好对学生的培训，尽量避免负面影响。有一位社工老

师认为，出现这个“扰民”现象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工专业落后，不能提供受益群体需要的服务；同时，这也和社工老师不能扎根有关。这么多年，一谈到公益服务还是去孤老院、福利院等；第三，在学校中，对于教师的评估和薪酬设计是课堂教学第一，实践教学第二。

三.

接下来比较精彩的就是来自接受通识教育、服务学习的学生们各自的分享了，非常感人。这也就是我开头提到的这个研讨会的第二条主线，关于“成长”的话题。

来自金字塔学社的刘焯主要的观点就是，学生在社团中的锻炼其实就是一种公民教育，他提到一篇论文，大家

有时间的话可以找来看看，《公民教育视野下的社团》。

来自马丁堂的杨刚的分享，提出了一个问题：“学生们需要通识教育吗？”，他认为这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思考的起点。他回顾了自己在大学里的生活，在进入大学之初，他期望能在这里得到“智慧、生存和启迪”。他说，“当一个人不知道选项时，如何能够选择？”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意义之一吧，向青年人展示多种可能性，知道这个社会可以有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在杨刚看来，在马丁堂的收获是：第一，获得了友谊，一辈子的朋友；第二，看问题的不同角度；第三，了解了不同的NGO；第四，精神和心智的成长。他

很喜欢这里的同伴学习。马丁堂另外一位分享者朱伟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爱”，对同伴、老师的爱，对世界、社会的爱。因此，她也会去回馈这爱。

我在这些作为通识教育参与者的同学的发言中感受到了“成长”这个主线，我看到教育在人成长中的角色和作用。

另外，在这次研讨会上，也听到了不少教育者和学生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未必有代表性）的状态的描述，归纳如下：“自私”，“没有社会理想”（不少人提到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往那些有社会理想和功利主义），“特别迷茫，迷茫到都不知道向谁说‘我很迷茫’”，“大学生想行动，但没

有路径，也不知如何行动，能否给什么支持？比如来自NGO的。”因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压力其实很大。

这次工作坊另外一大收获是，看到中大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是特别能讲，侃侃而谈。这个基础也是因为读了很多书。有一位即将在北师大珠海分校教书的老师刘涛，介绍了他们的草根的通识教育。他认为通识教育不仅仅需要在正规教育体系内发展，也可以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来自民间。他推动的托克维尔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详情参见其主题博客<http://readingclub.blogbus.com/>）。

这个俱乐部就是一个鼓励学生广泛涉猎的读书小组，其一套方法挺值得借鉴的。参与者

者要自主学习，同时也有导师，也有学长制的陪伴。他们的学习方法和规则是“阅读-吸收-分享”。第一，在每一阶段，每天分别阅读核心课本中至少一章的内容；第二，阅读的同时要做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应当是书面的，其制作规则，应按照摘抄、归纳、提问、感想四个环节进行；第三，如果有多于一个的参与者，参与者之间应把每天的读书笔记上传至博客，提供分享。这个读书小组的做法挺有创意哦。

这是一个成功的研讨会。我觉得，如果以后还要开，或许可以邀请更多的利益方参与进来。这次会上，已经有不少老师提到，他们的课程是和一些公民社会团体接触而产生的启发；也有老师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公民社会团

体作为支持机构。大家在批评现在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也说到问题不仅仅出在教育上，也不能仅仅靠教育完成。是的，人的成长是个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有来自学校的影响，来自家庭的影响，也有来自社会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培育公民、大学的通识教育这个话题上，除了邀请体制内的教育者、学生以外，也应该邀请公民社会团体，甚至公民行动的受益人。公民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进非正规教育中，他们也在成为正规教育领域的社会实践（或者说服务学习）中的对接点。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上，公民社会组织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也应该是更多公民社会组织思考的方向。

我们开自己的食品超市

——记美国纽约食品合作社

文/ 宋庆华

我的朋友Jennifer多次给我介绍了她在美国居住的社区食品合作社，每次听到她的介绍我都能感受到她为拥有自己社区的食品合作社无比自豪。2009年12月4日，借着在美国参加活动的逗留期间，我们访

问了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lyn)的社区食品合作社，英文名为Park Slope Food Co-op（以下简称食品合作社）。

食品合作社位于繁华的街区，居民居住密集。中午11点当我们按



图片说明：中为作者，右边的男士就是Joe Holtz

照预约的时间来到食品合作社时，正好有一些看上去像志愿者的人正在装卸到达的食品。从外观看起来这家食品合作社和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食品小超市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在不到两个小时的访问后我改变了看法。

社区居民自己拥有和管理食品合作社

食品合作社创办于1973年，是由10个居住在这里的社区居民合作创办的。

当年的创始人之一Joe Holtz先生接待了我们， he 现在是该食品合作社的总经理。他高兴地带着我们一边参观一边滔滔不绝地介绍，看得出来他为这家自己创办的食品合作社感到无比骄傲。

所有在这个食品合

作社购物的顾客必须是这个合作社的会员，每个会员在最初加入时要交纳25美元会员费，这是不能退还的。成为会员后要一次性交纳100美元的资本投资费，成为合作社的“老板”之一，但100美元资本投资费是当你离开这里或者不作为会员时要退还的(注：对低收入者，会员费和资本投资可以相应减少到5和20美元)。“目前食品合作社已经拥有15,000多位会员。”Joe Holtz先生边走边说。听到这里我不得不为这家不大的食品合作社拥有的会员数惊叹。

“我们的食品合作社与美国的其他合作社有一个很显著的不同，所有的会员必需定期作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参加无偿劳动，而其他合作社则不需要，

会员只是交纳会费就可以了。”Joe Holtz先生说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可以减少经营食品店的成本——人力工资，保持食品价格便宜，有益于全体会员；第二个原因则是会员们在一起工作可以相互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建设社区和加强社区关系。他还补充说：合作就是一起工作，这是他们创

办合作社的重要理念之一。

一起工作并参与劳动除了可以减低合作社的成本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也有机会学习工作，这是Joe Holtz先生的另一个理由，也是食品合作社的理念。会员的父母从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在合作社看到父母的劳动(工作)，等孩子



左上：
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会员
右上：
会员在做食品包装劳动
左下：
收银也是劳动的一部分

长到18岁时就可以参加合作社的工作了（在美国不到18岁是不可以参加工作的）。很多人都认为孩子能参加劳动学习工作经验这个概念很好。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认为，开始也有人不喜欢劳动这个概念，他们只认为食品的低价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我把食品合作社的商品与隔壁一家食品超市进行了比较，所有的商品都便宜0.5到1美元，有的商品的差价会更多），但是当它们参加一段时间的劳动后也转变了观念，开始喜欢劳动和一起工作的概念。他们开始发现合作的意义，并认为劳动有很多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劳动”？其实是所有会员都是食品合作社工作人

员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一个在这里购物的会员他们不仅是顾客，同时还是这里的服务人员。

会员如何参与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如何计算？如何管理会员参加劳动的时间呢？Joe Holtz先生说：合作社规定每一个会员每4周要参加一次合作社的劳动（工作），每次2小时45分钟。会员每次劳动（工作）都会被电脑记录下来，如果你超过4周没有参与劳动，电脑就会在你来工作时显示并给予警告。超过两次没有按时劳动（工作）的就会被罚更多的劳动时间（一般不仅要补回你没有完成的工作时间，还要多做一倍的时间，作为惩罚），更多没有参加劳动的就会被开除会员资格。如果你被开除，就不能在食品合作社购物了。

会员的工作一般分成五个部分：1、会员办公室——这是管理所有会员的机构，在会员办公室里日常有7人是会员，3人是全职人员，全职人员主要是做会员管理、新会员登记和指导新会员尽快学习工作能力；2、销售服务组——主要是收银员和负责帮助将顾客的物品送到汽车上，然后将推车拿回来放回原处，这个组只有1个全职人员，主要也是指导会员工作，其他都是由会员担任（如图）；3、收货卸货组——负责卸货和搬运采购来的商品（图）；4、包装组——主要是将购买的大包食品分装、过秤和贴上价格标签，便于销售；5、打扫卫生组——为食品合作社打扫卫生。Joe Holtz先生风趣地说，大部分人

是不喜欢做打扫卫生的工作的，所以如果你做了，你的规定劳动时间就可以减少至2小时，这样就会有人为了少劳动就选择打扫卫生。

解决社区就业

除了会员参与劳动外，到目前为止食品合作社雇佣了60个全职的工作人员，他们分别做食品合作的会员管理（接受新会员）、会计核算、采购和进货、信息系统维护等管理工作。我们在参观时看到位于二楼的办公场地，每一个房间都坐满了正在忙碌地干着自己工作的员工。所有的全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本地区。

合作社里还开办了托儿所。那不是我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托儿所，而是为来这里购买

食物的会员提供对他们孩子的照顾。另外，托儿所还为来这里劳动的会员照顾孩子。

倡导公平和环保的生活

选择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和公平原则是合作社会的价值认同。在食品合作社到处都可以看到标有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商品，有机食品是来自得到认证的农场和批发商，并贴有美国农业部的有机



食品标志。认证机构是独立于买卖双方的第三方组织，它们的资格由联邦农业部鉴定。绿色食品则是来自当地农户自家生产的产品。同时产品的来历也是很受关注的，如果某产品来自的农场特别保护农工的权利和公平，合作

社会优先进他们的产品，这也是合作社会员的意愿。

在食品合作社销售的有机食品不一定很贵，有的和一般的食品一样的价格。主要因为产品供销是直接的，没有很多中间环节。如果某种有机食品在一定的时期特别贵，一般合作社同时购进非有机的，便宜的食品，供顾客选择。

合作社还关注商品的生产商在对待劳工上是否遵循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如果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它的商品会贴上由“公平交易(图1: Equal Exchange)”这样的认证机构颁发的“公平贸易(图2: Fair Trade)的标签。Joe Holtz先生拿起了一串香蕉，指着上面的标志解释着。当我们走到牛肉柜台时 Joe



(图1)



(图2)



Holtz先生拿着一块牛肉告诉我们，这些牛肉是我们买来牛加工的。食品合作社销售的牛肉从来不买大的加工的产品，而是从专门的一个农户那里买牛。食品合作社每年向这家农户购买40头牛，原因是这家农户的牛只喂草，不喂任何化学食料。食品合作社没有加工厂，所以买回牛后要送到屠宰公司加工。购

买专门农户的牛主要原因也是安全，另一个原因也是成本低价钱便宜，店里的猪肉也是用同样的方式与养猪农户合作。

Joe Holtz先生还说：几年前，食品合作社会员投票抵制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会员不

允许在店里出售可口可乐的饮料，原因是印度可口可乐公司破坏当地水资源，哥伦比亚可口可乐公司则出现虐待员工等事件。合作社会员不允许这样的没有社会责任公司的产品在合作社销售。每年的会员大会都要进行这样的投票。

集体决策的会员大会治理机制

每月一次的会员大会主要讨论与合作社相关事宜，每次的议题都会在大会召开前提前公布。我很有兴趣知道会员大会都讨论什么，会员们都对什么样的议题感兴趣等。Joe Holtz先生说一般的议题主要是：讨论会员的工作时间、合作社房屋的装修、商店是否需要扩大等等。当然，关于

不允许销售可口可乐公司的商品也会是会员关注的议题。我很关注每一次会员大会都有多少人参加？Joe Holtz先生说这个不一定，最多的会员大会会有200人参与。

合作社为了鼓励会员积极参与会员大会，规定会员每年参加大会两次以上者可以抵消一次劳动时间。

我很好奇的是，在1973年，是什么促使他们要创建这样的食品合作社？Joe Holtz先生介绍，首创的人员都有同样的价值观，都反对美国的个人成功主义，都追求合作和一起做事的社区理念，当然也追求价格和产品安全。最早合作时还不叫食品合作社，只是一个纯粹的社区草根组

织，叫社区中心。初始的社区中心只有三个较小的房间，4年后成立了公司，就是现在的食品合作社，已经有两层楼和一个地下室，一楼是超市、二楼为办公室。而地下室有三个分别存放奶制品、各种肉类和蔬菜水果的冷库。合作社的房产已被全体会员买下，资金来源有三个：会员们缴纳的资本投资费用；合作社向部分会员借的有息贷款；从银行借的商业房屋贷款。这里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经费。他们很快就要完成贷款的偿还，这样食品合作社就真正完全属于社区自己了。

最近他们正在推进由会员大会通过的合作社向街面延伸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向市政府报了，正在等待批准。

当我问到食品合作

社的理事会架构时，我得到的回答是从法律的角度理事会应该是最大的权利机构，可是他们也想按传统，保持会员大会的决策权利。在具体操作上，先是由会员大会讨论并做出决定，然后由理事会按照大会的“建议”表示通过。多年的实践表明，会员大会能够最好地代表全体会员的集体利益，和理事会的法律责任没有冲突。

合作社的领导机构是9个总协调人(General Coordinator)，其中一人是总经理Joe自己，但他还是乐意用总协调人的头衔。为什么这里不用通常的经理的称呼，而用协调人呢？这是由会员大会讨论决定的。会员大会认为协调人更能够充分体现合作的理念，协调人主要的

角色就是协助会员一起工作。

其实美国在70年代初像这样的合作社有上千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前几年剩下的不到150个了，但是最近又开始有了新的发展。Joe告诉我，目前他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将食品合作社的模式在其他社区扩展，帮助其他新的合作社开始运营做技术指导。这个目标也是会员大会要讨论的议题，因为会员要讨论他们应该出多少钱可以帮助其他社区建立食品合作社。

我问Joe，如果大家发展合作社了，你们的会员不就少了吗？这对你们的合作社有没有产生竞争？Joe很快回答说：CO-OP是合作，我相信我们的社区食品合作社是成功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社

区建立这样的合作。听到这里我看到他眼中的自信。

也有新的 问题和挑战

我的朋友Jennifer一直是食品合作社的会员，她说合作社的会员平时也会辩论一些问题，比如合作社是否应该卖肉类。因为合作社的会员许多是素食者，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养殖业对环境有害，占用的资源多，合作社不应该支持。但也有人主张卖肉类，他们认为虽然自己可能是素食者，还是有很多人吃肉，只是应该鼓励他们买健康的和在人道的环境里成长的牛，猪，鸡肉。

还有的辩论是关于合作社是否应该卖啤酒和土豆片等“垃圾食品”。最后会员大会决

定都可以卖，但是要提供相对健康的品种，主要从小型的公司购买。

这些辩论可能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就是随着社区的变化和合作社的发展，会员的背景也变得更加多元化。最初的社区居民主要从事教育、文化、社会工作等，比较重视社会公正，比较容易接受合作社的一些理念。后来，尤其在1990年代以后，因为纽约市的经济繁荣起来，曼哈顿的房价提高了，很多做金融、法律等职业的人就搬到Park Slope这个社区，他们中有的也参加了合作社。同时，合作社的门面扩大了，食品的种类也增加了，会员也多了，这样一来，人们对食品安全和环保的意识提高了，很多以前不那么关注食品的来源的人就开始想买有机

或绿色食品。

不同的会员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想法。虽然不能一概而论，相对有钱的会员可能不那么重视合作的精神，主要想买高质量，健康的食品。因为工作也很忙，不太喜欢参加义务劳动，对价钱又不那么敏感。有的人会想办法补工作（例如给其他的会员钱让他们代替他们工作（这种行为已经被会员大会明确禁止）。有的老会员担心合作社失去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合作社的报纸上（“排队者通报”）会经常看到对这些问题的文章。

同时还有很多人希望合作社能维持它的原来的角色，不仅作为一个便宜的有机食品店，而在社区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可以说，合作社

在维持它原来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地满足新的成员的需求是合作社的新挑战，也是任何类似的机构都会遇到的。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希望合作社的管理体系更加健全，能让会员就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决定。



对你帮助的人存一分批判之心

文/寇延丁

许多从事公益事业的人说到自己最初上路的动因，都会说类似的话：看到世间的苦难（或者某种需求），就不能够转过头去。但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也许还会看到服务对象的另一面。

在筹到了首批一对一资助款项之后，为了执行细节，曾经给从事西部助学多年的王搏打过几个电话。说实话跟他沟通让我有很强的挫败感，王搏不仅指出了执行过程中的漏洞，也谈到了许多接受资助的家长和孩子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他的熟知，单听这番话，我一定会觉得，他是西部助学这件事和一对一这种方式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王搏

说自己做得久了，“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W和我们在同一区域做事情，地震发生第二天就赶赴灾区，在大山深处待到现在，跟他聊聊，可以收获一些“内部消息”，看到许多“另一面”。

有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震后截肢，很多个人和企业家为他捐款。孩子伤残严重，个人表现突出，家里的房子又垮得很惨，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事，W就是最早的关注者：“第一份大额资助还是我领进去的呢”。后来他发现孩子的父亲和村支书把这当成了“一个创收的途径”。只要有人，支书就往他们家里领，看到挤在棚子里的一家人，

看到孩子历年的奖状证书，谁都会动心，于是掏钱。然后孩子的父亲会与支书分成。被震垮的房子一直烂烂地杵在那里，一则可以成为募款的“道具”，再则他们也不打算在乡下建房了——孩子的父亲已经敛到了足够的钱，计划到城里买房。W叹息，在那个资源极度稀缺的地方，这其实是剥夺了原本能够降临到其它孩子身上的机会。

类似情况我们遇到过，也上当过。

我们去的地方灾情严重、资源匮乏，需求确定无疑。但不可否认，在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有些家长就是以要钱为目的，会夸大孩子的伤情和后续的治疗需求。灾区的悲情故事催泪指数是很高的，来去匆匆的外人一开始很自然会被带着走，陪人

一起哭，自己掏钱，或者回去募款。但是，如果能够在地方沉下来，时间足够长，走得见得多了，就会发现问题，觉得有些人在什么地方“不对劲”。一位长期从事西部扶贫的朋友说过，“几乎生活中所有黑暗的东西都能在这里看到。”

见到了这些殊堪可怜的悲情故事的另一面，怎么办？

会不会选择回避，告诉自己“我什么也没看到”？甚至自欺欺人，不同程度地与被资助人“合谋”，向捐款人渲染他们看到的苦难，向资助对象滥施恩惠，在公众面前成就自己的道德形象，在资助对象那里博得他们的感激？

应该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怀有一分批判之心，并能把这种批判付

诸行动。

W曾经发动朋友为一个病重的孩子捐款，家长拿回一张三万元的发票。后来他们去医院查账，核定实际支出仅占一半。“你救了他的孩子，但他还是会恨你。”

如W所说，这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在问题面前，诚实地面对捐款人和资助对象都是需要勇气的。要告诉自己的捐款人“我们错了”，“我们发布的信息是不准确的”。也许还会带出更具杀伤力的问题，是对所从事工作必要性的反思，以及对自己初衷和动机的追问。

比这种批判更艰难的是，在批判之后，能不能拿出一套解决方案。

王搏的选择是收集信息的时候事必躬亲，

执行资助时为了规避问题设计出了种种牵制的方案，保证捐款人的钱能都用到孩子身上，能够专款专用。

W的办法是多跑，一般与每一个资助对象接触几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确定资助，中间有许多不期而至的回访。震后一直泡在这个地方，W已经对村庄建立了全面了解，把自己变成了一部“乡村百科全书”。

我们费了巨大的劲搭起一个系统，把物质支持和非物质支持分开执行。在执行捐助的时候，对既往支出，硬起心肠追着家长要票据，对接下来发生的支出，委托保险公司审核执行。

对服务对象存一分批判之心，很痛苦，很困难，但很必要。为的是找到一套方法，既能

实施有效救助，又不至浪费社会资源滥用公众爱心。



2009.12.5：建筑工人关爱日

这一天，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高校的16个学生志愿者发起并组织了首届“建筑工人关爱日”活动，活动地点就在清华同方科技园工地。

他们在这里，为建筑工人募捐衣物与书籍，为建筑工人送文艺，探访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宿舍，与工人联谊等。12月5日恰好是国际志愿者日，他们希望通过学校社团联合举办这个活动，唤起社会对建筑工人的关注，并号

召大学生加入到为建筑工人的志愿服务中来，将我们的关注转向中国农民工群体中最庞大而权益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建筑工群体。

据了解，在同一天，武汉、南京、广州、深圳等几个建筑工人人数较多的城市也有学生自发开展对建筑工人的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详情请关注：[大工地博客](http://blog.163.com/dagongdi/)
<http://blog.163.com/dagongdi/>



(文/图 安全帽)

我有艾滋病毒，可以拥抱一下不？

是的，如果我有艾滋病毒，我可以得到你的拥抱吗？

11月29日下午3点，在成都春熙路和盐市口，20多名穿着同样T恤，打扮成熊猫模样的年轻人举着印有“您的拥抱能给我生存的勇气”的红色标牌，向路人展开双臂“索取”拥抱……仔细看看这群人，每人背后都有“关怀艾滋，消除歧视”八个醒目黑字。他们是“爱白成都青年中心”的志愿者，想通过这次

街头“快闪”活动来宣传国际艾滋病日，真诚希望更多人给HIV感染者以温暖的拥抱。

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面带微笑向路人致意，一举一动引起了市民强烈好奇，有的干脆跟在身后看个究竟。很多市民也是爽快上前拥抱了“HIV阳性感染者”。“来，和妈妈一起拥抱叔叔阿姨！”一名年轻的妈妈牵着儿子的手走到一名志愿者跟前，给以热情的拥抱。“我希望大



(文/图 爱白)

家都来关注这些特殊人群，小孩也应该从小懂得相关知识。”这位妈妈说。不过，也有的市民还是有些难为情，笑了笑就走开了。

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共有110位市民拥抱了这些“大熊猫”。每一位主动上前拥抱志愿者的市民都获得了红丝带系成的小礼物。

“和谐民族的一盏微光”

2009年《南风窗》杂志的“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又出来了，其中的“年度组织奖”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维吾尔项目获得。

颁奖辞这样写道：

该项目旨在帮助在京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其他民族的人



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摆在该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扭结的族群矛盾，需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

又是一年“11.19”

“11.19”是一个日子！

“11.19”是一个我们不会也不能忘记的日子！！

因为这个日子还被八十几座荒凉而静寂的坟莹记起。

因为这个日子还被痛失爱女的老人们那木痴的眼窝里点点泪花记起。

因为这个日子还被几十名打工妹身上的伤痕和残肢记起。

所以这个日子还被关注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的各界人士一直记起！！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一场大火令八十多个花季少女鲜活的生命逝去，让五十多名豆蔻女孩烙下终生伤残。逝者如斯夫！痛定思痛，沉痛的往事我们不能忘记，才能避免更多的悲伤。

16年后的11月19日，重庆忠县自强服务站邀请了部分致丽工友和其他工友共同来纪念这个无法忘怀的日子。每位工友都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现实情况，交流各自的感受，她们一致认为，职业安全与健康仍然是工友们面临的

最大隐患和风险，应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这一行业。在保护好工人的基础上，才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文/图 陈玉英)



“听草原的孩子，讲草原的故事”

“我们家的那只骆驼是我妈妈养大的，每年10月份，它都会从遥远的牧场回来，好像是为了看望我们共同的‘妈妈’……”这是2009年12月，内蒙古大学社会学院的淖高岱在讲述她的故乡阿拉善牧民和骆驼的故事。

在配着画面的歌声中，讲述草原故事的孩子眼里闪着泪光，分给大家的奶豆腐、风干肉里，有蒙古包牛粪炉子的味道……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学生以“美

丽的草原我的家”——牧区衣食住行；“我的父亲是牧马人”——马和马鞍的故事；“鸿雁”——五畜的故事；“旅行者之歌”——阿拉善骆驼和移民的故事，为大家讲述了记忆中传统牧区生活的衣食住行，自己与草原、五畜（牛、马、骆驼、山羊、绵羊）的真实故事。分享会让北京的学生们透过与自己同龄的蒙古族学生的生活和视角，认识了饱含着草原文化和牧民情感中的草

原。

分享会源于三个月前天下溪“人与草原网络”组织的一次草原游学。他们带领相关专业的北京、内蒙古研究生，深入牧区调研考察。游学路上，草原的美、牧区的文化、牧民的现实生活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学生，大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草原的美，了解草原的问题和困境。于是游学

团队与天下溪共同策划了“听草原的孩子，讲草原的故事”活动，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科学院举办。

此外，天下溪《草原故事》小手册系列——《牧民的故事》、《歌手的故事》已新鲜出炉，正在义卖中，以支持“人与草原网络”的发展。手册中，有大量牧区生活和歌手的精美图片、优美绵长的文字介绍和小故事、精选的蒙古谚语，淡黄轻型纸的空白页可作笔记和画本使用。手册15元/本，数量有限，如需购买请与v系。

(文 周维)



大象粪便来造纸

不少斯里兰卡政要和商人在与外国客人见面时会客气地呈上一张名片，并特意强调：“我的名片是由大象的粪便制成的。”闻一闻，非但不臭，反而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是怎么回事呢？

斯里兰卡有一个“大象孤儿院”，收容了近百头与象群走失的大象。院里的负责人曾为每天堆积如山的象粪苦恼不已。一名商人经营的造纸作坊恰好挨着“大象孤儿院”，他则为原料供应不足而发愁。于是，一个玩笑似的提议成就了一项新产品。这一意外发现使商人兴奋极了，他决定把自己的作坊注册成为一个纸业公司，并用亚洲象学名中的后一个单词给命名，即“马克西莫

斯”。

其实，大象的粪便并不是那么“丑陋”，它颜色金黄，本身也没有什么腥臭气味。象粪纸成本低，产出却高得惊人。一般情况下，一头成年大象平均每天要排出100多公斤粪便，1公斤象粪就能制造出60多张A4大小的纸张。因为使用了特殊工艺，象粪纸不但没有臭味，而且手感非常细腻。

象粪造纸给大象孤儿院和当地工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给斯里兰卡这个饱经战



乱的国家赢得了殊荣。2006年，在荷兰举办的“世界挑战”大赛中，象粪纸以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有效利用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超人创意一举夺冠。

如今，象粪纸已成为斯里兰卡人引以为豪的国宝，很多名人政要用象粪纸作自己的名片。还有不少高级酒店用象粪纸制作成《入住须知》和别致菜单。象粪纸还一度被斯里兰卡政府包装成精美的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

如今，斯里兰卡的象粪纸已远销欧美和日本等国家。不少国家也纷纷效仿，泰国也用大

象粪造纸，美国的动物园也进行了尝试。德国的动物园除了用大象粪便做纸外，还从象粪中提取绘画的颜料。





《请投我一票》纪录片 导演：陈为军

影片记录了2007年中国武汉市常青第一小学三年级一班的一次班长民主选举。班上同学将从老师们选出的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下一任班长。这三位候选人分别是：许晓菲，一名乖顺、不善言辞而不具威胁力的女学生；成成，一个天性活泼、有着演讲天赋的挑战者；罗雷，以暴力管理班级的现任班长。为了让孩子们成功赢得竞选，三名小候选人的家长们纷纷出谋划策；而候选人为了争夺选票，也使出了在成人世界里常见的拉票手段，以更为稚嫩而直接的形式，展现在荧幕前。

《看见看不见》纪录片

导演：云·温达斯、马力阿诺·巴罗索、伊莎贝拉·科榭、哈维尔·打库耶拉、费南多·阿拉诺

五位知名的导演透过电影中的真人真事，为五群活在最受遗忘的人道危机中的受害者发声。他们分别将刚果、乌干达、哥伦比亚三个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嗜睡症、美洲锥虫病两种鲜为人知的疾病，拍摄成五条独立短片。制作这部电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揭示世界上一些最危急的情况，并将受害者从漠不关心的阴霾下拯救出来，尝试为这些受媒体所忽视的人民和困境寻找公义，并给予大众由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的机会，也藉此向为这些人民提供援助的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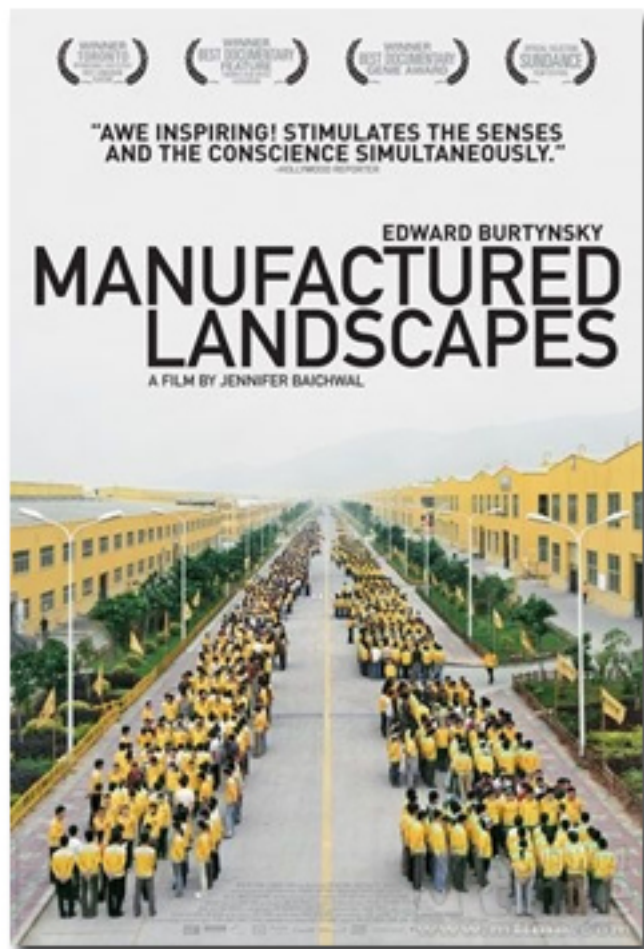


《人造风景》纪录片

导演：Jennifer Baichwal

一个长达五分多钟，在福建省一个超大型的工厂内拍摄的移动镜头，揭开了纪录片《人造风景》(Manufactured Landscapes)的一系列动人心魄的景观。导演跟随以拍摄工业风景著名的摄影师 Edward Burtynsky，深入到中国福建的工厂区和回收工业垃圾的乡村工场、四川境内的三峡大坝、天津的煤矿基地、上海的新富人家和穷困弄堂，还有孟加拉国的拆船厂。在纪录 Burtynski 的工作的同时，发展出另一条交织着强烈的伤痛情怀和批判精神的叙事线索：一个领土广阔、人口超载的国家，因谋求发展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如果这个国家最后终于强大，我们应铭记今天它的每个家庭、每个人在财产和心理上的双重付出。就算家园梦破，流离失所，就算环境污染，礼崩乐坏，为了一个更

好的明天，我们也要接受。



《无米乐》纪录片

导演：颜兰权，庄益增

75岁种稻的阿伯说，种田对他来说是一种修行。风吹、日晒……有时候台风来袭，农人是无法抵抗的。禅——就是不让你反抗，你甘心忍受。农人都是如此忍受。

无米乐，纪录台湾的大米仓之一，台南县后壁乡三个老稻农的劳动与生活。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汗珠和着一粒粒的稻米，陪他们走过了大半个世纪，透过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推荐者说，这部片子表面上是反映农民生活的，实际上却有更深的内涵。人生就像种田一样，是一种修行。农民的生活是清贫的，但是，本片中的几位阿伯却可以苦中作乐，这是一种历练之后的智慧。如果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看着他们种田，其实就是在向充满生活智慧的老人们学习生活的观念。



@民間

第八期/2010年

在线阅读/下载: atminjian.ngocn.org

博客: zaimianjian.ngocn.org

联系邮箱: zaiminjian@gmail.com